

焦虑体验与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诉求

江腊生, 程丽华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百年中国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普遍性的焦虑体验。它与传统的忧患意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既展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存在状态,也生成了文学史内部人的观念。政治与人性、欲望与消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焦虑,产生了新时期文学内部的价值张力,也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复杂多元的审美诉求。

关键词:转型;焦虑;忧患;审美诉求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6-0058-07

Anxious Experiences and the Aesthetic Appeals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JIANG Lasheng, CHENG Li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China forms the social universal anxious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She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but they fuse mutually, which not only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generates the internal concept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 conflict and anxiety between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desire and consumption, tradition and modern age produce the value tension of literature itself in the new era, and manifest the complex and multivariate aesthetic appeals at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anxiety; suffering; esthetic appeal

一、焦虑:作为文学阐释的一种方式

“焦虑”原本属于心理学术语,是指一定主体对现实情境所体验到的一种含有忧虑、不安、恐惧、紧张和苦恼的情绪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带有不愉快情绪色彩的心态。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潜意识、本我、本能追求满足的强大心理能量,既同超我的控制相冲突,又与外界现实相矛盾,从而产生内在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得到部分释放或完全释放,张力才能减少,矛盾才能解决,身心才能恢复平衡。但是,往往不能如此,因而压抑与抵抗之间的矛盾就会形成焦虑。^{[1] [p314]} 在弗洛姆看来,“人摆脱了束缚他的所有精神权威,获得了自由。但恰恰是这个自由使他孤独焦虑,使他为个人的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感所淹没。这个自由而孤立的个人被他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体验所击溃”。^{[2] [p58]} 同样,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霍妮把焦虑解释为“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3] [p373]} 她指出,这种基本的焦虑,不属于先天的生物本能,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文化冲突造成的。不管焦虑如何定位,焦虑的根源来自何处,都体现了西方哲人对近现代以来人类生存处境的探求。如果说弗洛伊德的焦虑,更多的是重视个体的内在因素,是一种生命本能层面的焦

收稿日期:2015-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编号:09CZW064)

作者简介:江腊生(1973-),男,江西婺源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

虑,那么霍妮的焦虑理论则重视个体的外在因素,是一种社会文化冲突下引起的个体内在世界的焦虑。

对于广大中国作家的理解而言,多来自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布鲁姆指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4][p4]}这里的“焦虑”是一种艺术创新的途径,而对中国作家来说,则具体表现为一种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横向焦虑。洪子诚认为,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焦躁地期盼伟大作家的出现。其中有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认同焦虑,有本土文学的代际焦虑。显然,评论界近年来频频出现文学焦虑症的说法,是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学面对西方强势的话语作出近乎本能式的反应,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参照下的求新焦虑。

然而,纵览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固然有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学审美的参照体系,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条与日俱显的焦虑主线,弥散在文本中构成无处不在的情绪空间。也就是说,焦虑体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无论“五四”文学、普罗文学,还是新世纪的个性写作、消费写作,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启蒙革命到市场改革两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挣扎感、获解放感、阵痛感和困惑感。其中有来自社会文化层面不同话语世界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个体内心世界的冲突,或来自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中西方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它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撞击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有时鲜明地表现为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左奔右突、模棱两可的关系。正是这些复杂多元的冲突关系,引发作家主体的焦虑不安,并透过他们的内心观照,编织出各种不同价值冲突之下富有张力的文学空间。也正是这些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焦虑体验,驱使中国文学一步步走进政治化、市场化与审美化之间的尴尬境地。

以焦虑为考察文学的一种视角,绝非想当然地建构文学史的叙述方式,而是结合百年中华民族走过的情绪历程和文化踪迹,探讨文学主体内部各种话语谱系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触摸到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心灵流动。将焦虑体验作为研究的一条主线,意味着文学阐释的两种努力:一是尽力避免文学批评政治化或市场化的简单倾向;一是从个体的创作心理出发,把握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与个性特征。这里的焦虑,不是心理学层面的单纯人性探讨,也不是单个的某一个作家个体或人物个体的人性品格研究,而是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入手,探讨这种时代情绪在文学审美中的现实诉求。

二、焦虑与忧患

讨论中国文学的焦虑,绝不是弗洛伊德标举的精神分析层面的“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现象”,而始终与中国的文化、政治、革命历史、人道主义等诸多范畴联结在一起。一方面,中国文化土壤没有西方心理层面挖掘个体精神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天人合一”,将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价值追求相互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中国文人的身上,无所不在的焦虑总是自动投射到外在的国家、民族、天下等层面。分析中国文学的焦虑,必然不能单纯套用西方纯粹的焦虑理论,忽视其中忧患的精神与意识。

文学忧患的产生是因为具体的事件变故,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引发每一个有责任担当意识的个体朝着外在的具体事实运动,将个体的存在上升为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层面,进而反抗和改变这一事实本身。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革命战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都是导致人们产生忧患的具体事件。谢冕在《忧患: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4]一文中指出:“忧患是一种贯彻始终的情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有着纷呈万象的巨变,唯一不变的只是忧患。”这种情致来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传统的责任意识,直接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力量的纠缠局面。他们并非不欣赏世界文学中的那种普天之忧,但如果真让他们放弃国家、民族这一空间度对自己的制约,而去忧天下或者忧个人,他们便会感到失去忧患的支点,从而也失去了力量。

因此,文学忧患属于外向型的精神指向,必然与一定时代的主流话语需求结合起来,从而求助于一定力量性的话语批判和鼓噪。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文化倡导,到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改革文学等,都体现了政治话语在文学忧患之流的前后贯穿、一脉相承的关系。乡土小说、新写实小说、打工文学等呈现苦难化叙事倾向,左翼文学、革命战争叙事等则凸显斗争的惨烈与艰难,改革文学则凸显改革者遭遇到的艰难与阻力。深重具体的忧患现实指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

真切而强大的力量,唤起民众潜在的责任意识,也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忽略的特征:力量型与功能化。这些忧患主体未经内在的反复咀嚼,对外在的时代事实作单一峻急的叙述和批判,从而缺乏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挖掘与反思。

焦虑则重在主体内在冲突的持续运作,它往往与焦虑的事物、事实语境保持着一种互动的模棱两可的关系。当外在的某一或一系列事件与变故,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一定主体的存在时,主体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反应,而是通过主体产生一系列内在的冲突,众多冲突相互纠结、相互缠绕,引发人们反思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罗·洛梅指出“焦虑之所以没有特定的对象,是因为它所敲击的是我们知觉经验的心理结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得以与客观世界相区隔的基础。”^{[5] [p174]}可见,由于内在的冲突在文本中的相互缠绕,文学焦虑直逼的正是主体的内心世界——人性的真实。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循着“文化寻根”的路径,寻求民族文化性格中相对稳定或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却又遭遇后现代式的解构语境;努力从民族秘史和人性史的想象出发,发现民族前行的动力,却又按捺不住皈依宏大的正史叙述;不断从民间传奇性的故事讲述中吸取营养,却又在魔幻的旗帜下与消费话语悄悄结盟。这些历史与人性的多重冲突,在文本中产生了独特的美学张力。

内在的冲突是焦虑的本质,它一般不以明确指向的矛盾存在着,而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一种面对生存危机而产生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如果说忧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为民族、国家等十分紧迫的具体事件,焦虑则偏于个体的人生、内在的世界、普适性的人性等超稳定的结构,正好与文学的审美本质悄悄达成了一致。文学焦虑的产生,本质上是一定社会个体面对外在社会危机,而与自我的价值期待形成相对的落差,构成一个既有社会内涵又有人性深度的文本张力世界。它既有外在的社会时代危机的因素,又由不同个体自身内部的性格等决定。

因此,“人因为既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无限,所以是焦虑的。自由与有限存在的吊诡情境,使人生而焦虑”。^{[6] [p182]}文学真正的生命就在于自由与有限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焦虑在作品中形成的审美张力。它不是单一方向的运动,而是复杂交织的多元冲突的结果。文学焦虑的内在冲突本质,决定了文学注重人性的深层表现而具有了丰富的美学张力,而忧患则由于其外在的指向和情绪的强烈,决定了这类文学力量有余而反思不足的特点。可以说整个20世纪文学忧患的成分大于焦虑,决定了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责任太多地纠缠在一起,缺乏内在的文学反思与人性诸多可能性的表现。

实际上,文学焦虑与忧患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换。考量20世纪中国的文学创作便不难发现,忧患和焦虑犹如一道解不开的绳扣,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中的审美情结。在很多作家那里,焦虑与忧患互相渗透,不像弗洛伊德等人的焦虑理论集中在个体内在的冲突与矛盾,而往往外化为个体参与人类历史的价值冲突与渴望。郁达夫说“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7] [p17]}郁达夫在个体的性、生存等压抑与焦虑之中,融入时代的忧患意识,并在个性气质与社会忧患之间的焦虑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情结。新时期伊始,很多作家当年青春的激情与革命的承诺逐渐成为了记忆,痛苦的生活体验与内在的人道主义追求构成了焦虑。他们在稍作咀嚼之后,潜在的传统忧患意识在主流意识形态牵引下,很快投入了伤痕反思与现代化改革的文学追求。而1990年代后的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则在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境遇当中自然接通了传统文学忧患意识,而知识分子遭遇消费文化浪头冲击后的短暂的焦虑很快被召唤并转化为文学的忧患。它在消费文化的绵软之中带来了文学忧患的刚硬之风,但以缺乏文学反思深度为代价。可以说,文学的焦虑在空间上接通了文学的世界性,向人性的纵深之处努力掘进,而忧患则接续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责任意识与民族特性,给文学带来了批判的力量。二者相互融合,真正的价值在于形成一定既有人类价值又有民族特性的美学内涵。

三、新时期文坛的话语焦虑

战争迭起,政治运动不断推进的现代中国,自然容易产生忧患意识,而快速变动又相对自由的近三十年则容易陷入焦虑状态。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生态等领域在强大的西方参

照面前不断高速追赶,必然出现危机四伏、焦虑不安的全民现象,成为近三十年文学的基本图景。政治与人性的话语冲突,欲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传统与现代的美学碰撞,这些因素在文本内部相互冲突,构成了新时期文坛普遍的话语焦虑。文学进入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状态。

1. 政治与人性

对于近三十年文学而言,走出强大的政治话语的束缚与统摄,寻求文学的自由与空间,始终是作家们努力的方向。自新时期以来,人道主义的论争、个性化写作等,无不在努力释放久被压抑的人性情感、缓释内在的焦虑,使文学重新回到世俗生存的面面。

考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众多文本,留给读者最大的阅读空间的是令人难忘的情感因素。《伤痕》中王晓华与她的母亲之间相见恨晚的情感遗憾,与男朋友苏小林之间的柔情处理,率先冲开了当时政治话语僵硬的一面,呈现出文学一定的柔软之处。《在小河那边》中,天各一方的兄妹因为历史的巧合走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濡以沫,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读者情感投入,也为他们冥冥之间的乱伦而叹惋,更为他们最后因为母亲的一纸遗书而雀跃,跌宕起伏的情感流动,人性深处的萌动,开始以蹒跚的步伐走进文学的美学殿堂。《芙蓉镇》中芙蓉仙子胡玉音的美貌,她与怯弱求全的丈夫桂桂,与患难生情的秦书田,都给人留下一片缠绵凄切、意味悠长的情感空间。李国香身上的妒意十足,与王秋赦的原始人性式的偷情,又无不让人感到一种人性的深刻。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文本中,笼罩全文的是反复缠绕的、艰难而又沉重的改革氛围,真正吸引人的还是情感的脉络。《新星》中李向南与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沉重的翅膀》中邓子云与妻子之间沉重而又无奈的婚姻状态,打开了一扇文学的人性之窗。小说在读者面前展开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以往政治图景的人性画卷,它在拨动读者的心弦的同时,使文学具有了一种世俗情感生活本该有的人间烟火味。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宏大的政治话语被日常性的物质生活无形中弱化和淹没,从新写实小说,到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到底层文学、官场小说、网络文学等,大致都可以勾勒出日常生活叙事剥离政治话语的脉络。文学能够在相对自由多元的世界向世俗的生存、欲望、困惑等层面深入,没有以往的宏大政治话语的强行贯穿,文学在琐碎性、边缘性、多样性的话语空间实现了日常生活叙事的轻盈与灵动。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政治话语一直是中国文学强大的话语力量。自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以来,文学的政治诉求或政治情怀,始终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文学在努力解构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很多作家在倾诉自身的人性伤害时,往往与主流政治话语携手。无论主动间离政治话语,还是皈依政治话语的合法化权威,文学总是无法绕过政治意识形态的边界,从而难以确立文学自身的合法性。《伤痕》中的苏小林与王晓华最后声讨四人帮的罪恶,并融入到一片灯火之中,隐喻文学走进一个全新的话语世界。乔光朴、李向南等形象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正是满足了刚步入改革时代的民众的现代想象。文学在书写现实问题时,传达了一个官方意识形态预设的话语世界。寻根文学背后的文化企图,不单是努力构建一个审美的艺术空间,而是文化政治化的追求,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富有文化优越性的意识形态空间。到了新世纪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其中浓烈的“不平则鸣”的底层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暗合了曾经的革命政治伦理。这些文学在疏导底层民众的压抑情绪时,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也直接传达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

本质上,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话语焦虑,构成了当下文学欲说还休的状态,既是当代国人文化心理的呈现,也是作家内心世界的体现。

2. 欲望与现实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欲望却在一个相对自由多元的语境下犹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刺激不同的主体并形成各种焦虑,构成了时代主导的情绪氛围和文化心理。

民众是生存欲望与现实语境之间产生焦虑的基础。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到拨乱反正运动的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再到市场经济时代,从集体主义时代到多元共生的喧嚣时代,中国人民在生存空间的渐变中产生焦虑。所谓生存空间的焦虑,是指处于“现代性”变革或转型的人们遭受外部环境的挤压所生成的浮躁、挣扎、荒诞、无奈等心理状态。文学倾心的大都是现代性附着

的空间,或者是大量的城市意象、城市设施和城市文化替代物书写,或者是乡土世界的诗意叙述,或者是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参照性书写,生活图景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当下人们生存的焦虑及其缓释的图景。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欲望是生存空间的追求。农民进城,遭遇的是城市文化、城市伦理,感受到的是来自城市现代化的物质欲望的吸引,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血液当中。当他们无法融入城市时,无奈之中回到农村,却发现农村已经不是昔日只要勤奋劳作就能致富的状态,市场欲望渗透进了农村,改变其中的运作方式,也改变了乡村的伦理。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领工资的地质队员和民工之间的巨大身份悬殊,引发了民工极大的身份焦虑,最终酿成了一个人性悲剧。《废都》中的庄之蝶,由于遭遇市场经济的浪头,知识分子的身份遭到消解,其身份焦虑引出了新儒林外史式的生活图景。这些生存图景的落差引起的身份认同危机感,生存图景想象的焦虑转化为不同个体在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焦虑。

欲望来自身体的内部,却在市场消费时代形成了一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它没有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导训姿态,也不通过某一权力机构来强行实施这一话语的威力,而是充分调动身体内部的本能因素,通过时尚消费的巨大牵引力,将芸芸众生纳入这一权力话语之下。朱文、韩东、卫慧、缪永等人的欲望书写是对肉体欲望、金钱欲望的顶礼膜拜。在《我爱美元》中,朱文通过一个父子同嫖的故事,扫荡了对终极价值的幻想,把欲望拉向最原始、最实在的性欲。卫慧则在《上海宝贝》中通过天天和马克之间不同的欲望书写,将性爱分离的另类模式通过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欲望话语的权力,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纷纷占据主流,牵引作家的创作。这些欲望文本之中,我们看不到欲望对灵魂的冲击,对人性的呼唤与拯救,而是一系列的“我爱美元”、“美元胜过人民币”、“欲望手枪”、“驶出欲望街”等令人震惊的话语形式。正如戴锦华指出,女性文学“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去切入历史。……切入的叙事社会,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8] [p198]}相反,张承志、张炜等人以皈依宗教和融入野地的姿态,与物质欲望决然分开,而坚守精神欲望的神圣空间。这种欲望的极端化处理,正是当下作家面对强大话语诱惑而缓释焦虑的体现。

本质上欲望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它既包括心理精神的一面,也包括物质经验的一面,二者在不同的焦虑主体身上产生冲撞,给当下文学展开了一个新的审美图景。从此文学不再仅仅停留在现实经验的坚硬表层,而是探入主体的欲望世界,在欲望与现实之间触摸到人性的柔软之处。如莫言的《四十一炮》,“通过儿童视角、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运用讽喻和象征等表现手法,借‘炮孩子’罗小通的悬河之口所‘炮制’的‘世说新语’对于种种超出了‘正常域值’的人之欲望予以了嬉笑怒骂式的描述与批判,揭橥了种种非正常、非理性的欲望之所以产生的根源,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人性的根本弱点”。^[9]在莫言看来,“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是欲望的奴隶,都值得同情,也都是必须批判的”。因为无论好人坏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完全是外部原因导致的,最深重的苦难来自内心、来自本能”。^{[10] [p176]}。

3. 传统与现代

一直以来,横亘在新时期作家面前的两座大山是鲁迅和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两个巨大参照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直到青春写作、农民工书写,每一拨文学潮流的涌动,都体现了当下文学的美学焦虑。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各种文学观念的借鉴,文学题材的突破,表现形式的试水,一切都在现代性的旗帜下不断努力实践着审美的突破。

然而,传统的美学习惯与思维模式,又屡屡左右作家的创作,貌合神离的现象经常发生。很多小说努力探讨人性、情感等现代因素,却依然采用民间传说的叙述模式,引起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与人性反思,促成新时期初文学社会效应的最大化。《芙蓉镇》中胡玉音与李国香之间的伦理道德层面的善恶对立,谷燕山与李国香之间的政治道德层面的忠奸对立。胡玉音的“民女遇到才子”是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结局的现代版;她的“领导解救”同样是大众社会依附清官意识的政治诉求。这种苦难故事的叙事模式,“在叙述效果上满足了民众要将文革历史戏剧化、伦理化和黑白分明化的审美需求”,许子东从情节功能的角度将它命名为“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叙事模式。^[11]这种情节结构模

式,主要以人性善恶的关系构建人物形象谱系,形成善恶对立的二元冲突模式,最终根据善恶因果关系来安排“大团圆”结局。其他如《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无不如此。而在《新星》《乔厂长上任记》等文本中,很多形象依然按照传统的清官形象和无产阶级英雄叙事的模式来加以塑造,并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深处,考察他们在改革大潮与市场变革中的情感历程和心灵流动。这些改革书写往往热衷于干部人事关系的变动,重在表现他们的执政权术,却很少涉及现代经济管理的常识把握。到最后,改革者又往往求助于背后的人物,乔厂长求助于霍大道,李向南求助于省委书记,这与古典戏剧中求助于钦差大臣手持的尚方宝剑并无本质的区别。这类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为剑拔弩张的态势,双方的较量被过分地传奇化、喜剧化”。^{[12] (p414)}

“马原的叙事圈套”算是“先锋”的写作。然而,小说中天葬的传奇,顿珠和顿月的故事,麻风病村的神秘,还是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只是马原用元小说的叙述手法将其贯穿起来,故事的叙述不断延搁或中断。作家带着传统穿过形式之林,二者之间始终处于焦虑与冲突之中。因此,马原在“先锋”了一阵之后说道“小说变成了一种叫人云里雾里的东西,玄深莫测,不知所以,一批创造了这种文字的人成了小说大师,被整个世界的小小说家尊为圣贤。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乌纳穆诺,莫名其妙。”^[13]因此,马原事后抨击自己的晦涩、古怪、荒唐之风,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到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本身就体现了文学审美与消费之间的焦虑。这个本质决定了“个人化写作”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术语。它既满足人们对人文深度的需求,又能轻易地进入人们的商业消费视野。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折射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莫言带着厚重的传统与现代、审美与消费之间的焦虑,以“魔幻现实”的方式获诺贝尔文学奖,破解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焦虑之谜。然而,当下文学不断向故事性、传奇性特征后撤。网络文学追求的快捷和猎奇,青春文学追求的依然是老套的恋爱故事,历史叙述充斥的是一些历史事件的戏说与情境的怀旧式消费。文学的形式开始成为消费形态的一部分,卸去了以往文学太多的意识形态或伦理负担,却迷失在市场话语的喧嚣之中。

四、焦虑叙事的价值与缺陷

本质上,焦虑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带来内心绞缠的冲突,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一定焦虑主体反复咀嚼来自各个方向的冲突,逼近了人性的深处,文学开始具有一定的美学张力,而不是简单的、训诫式的文本指向。尤其是当下相对自由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的焦虑开始超越忧患的局限,文学表现的纵深力度越来越大。

首先,文学的品位具有了不同的气质。文学的焦虑叙事具有了一种非力量型的,无以名道的韵味,为真正的文学价值提供了新的尺度。这不是只有焦虑型的作家才能创作出既有张力作品的作品,而是要求作家能够将个体的生存体验投射到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并形成多元复杂的冲突,文学因而具有一种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性格相互融合的状态。这种非一般的心理状态,使作家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的羁绊,以极其率真的方式抵达人生真谛的领悟和人性世界的内核。

其次,焦虑提升了文学的反思,并构建了一个相互绞缠、道不清说不明却又空灵的文学世界。“焦虑具有反思的性质,因为个人参与人类历史之故。”内在的左冲右突决定了它与个体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最终在个人性的困惑与思考中抵达人性的本真。存在的焦虑体验不仅包括属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危机与恐惧,也可能包括个体存在所认同的精神价值与意义的失落,或者说无意义感的威胁。当个体在一定历史中反复咀嚼和承受生存的威胁与冲突时,必然向历史、人性的深邃之处,努力发掘黑暗洞穴之中的人性之光,寻求人性自由的诸多可能性。此刻的个体才有了寻找及思考的可能。正是这种令人困窘不安的体验中,作家最直接地洞见了日常生活中难以窥见的自我本来面目,瞥见了自己多重人格的各个侧面,更深切地感悟到个体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的复杂存在,探究到人类终极的深邃层面。

毫无疑问,焦虑叙事往往执着于个体内在的冲突,在反复咀嚼的同时,也带来了视野的狭隘。陈染、

林白执着于表现心灵世界的深邃幽微,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敏感而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女性丰富的内心感受,如孤独、恐惧、自闭、自恋、同性恋、死亡冲动以及被压抑的欲望等。她们的写作开拓了以寻找一种精神满足为旨归的女性形象的心理空间,使女性写作的思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很多女性作家“过于沉入女性的幽微之中,很容易使自我封闭,从外在世界退回内心,面临着自我重复、创造性干涸和感觉迟钝以至于退化的危险。久而久之,作品还给人以小情调、小自我和小视域的感觉”。^[14]她们在自觉不自觉地展示自己内心的痛苦、焦虑和无奈时,往往停留在自身一己的体验上,甚至仅仅来自身体内部的体验,而缺少向外投射的能力,因而显现出表现空间的狭隘与思维的闭锁。

文学焦虑若没有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统摄,往往会极端化地观照事物、人性,很多作家在审美焦虑和市场经济话语的诱惑之下,往往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达到缓释内在焦虑的目的。王蒙发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15]一文,以一个当红作家的敏感指出了文学的边缘化趋向,也明显隐含着其内心失去轰动效应的焦虑。当市场话语凸显之后,事件仍然是当代中国作家解除焦虑的主要手段,不过由政治制造变成了市场制造而已。比如人文精神讨论、文学大师排座次、“断裂”行动等。邱华栋等新生代作家明确表述他们的创作为“焦虑感下的写作”,同时又声明“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如果他们的那叫写作,我们就不是写作。”^[16]显然,这是遭遇市场浪头的一代作家不断通过廉价的表演,来缓释他们内心的迷惘与焦虑。一方面作家想体现自身创作的“个性化”,另一方面又急于求得主流话语和消费话语的认同,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焦虑,决定了“个性化”变成一种缓释焦虑的媚俗。当作家心甘情愿地向消费时代的欲望举起双手时,小说家的责任也就彻底放弃了。欲望成为无所不在的叙事主题,身体叙事、暴力叙事、游戏历史等大行其道,在一种宣泄的快感中,走向了极端化的叙事边缘。哈罗德·布鲁姆说“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17] (p27)}追求轰动效应本无可厚非,但本质上这些作家缺乏深厚的文化精神,无力穿透自身的焦虑,而呈现漂浮在社会表层的姿态性写作。

对于当下中国文学而言,文学焦虑注定要与忧患相融合,在作家作品中既有内在的冲突,又富有传统的忧患责任感,在力与美之间寻求一种美学平衡点。喧嚣世界中保持和谐澄明是一种个体自由的艺术境界,而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忧患传统,又决定了文学深层的责任意识与精神担当。只有二者互相融合,作家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反复咀嚼和释放其中的焦虑与冲突,并以内在的和谐澄明穿透之,才能打造出既有人文情怀又有审美张力的文学世界。

参考文献:

- [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 [3]〔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4]谢冕.忧患: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J].南方文坛,1998(2).
- [5]〔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6]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M].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41.
- [7]郁达夫.郁达夫文集(5) [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 [8]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 [9]张瑞英.一个“炮孩子”的“世说新语”——论莫言《四十一炮》的荒诞叙事与欲望阐释[J].文学评论,2016(2).
- [10]莫言.小说与社会生活——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A].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C].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 [11]许子东.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J].文艺理论研究,1999(4).
- [1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3]马原.我和小说[J].小说月刊,2007(3).
- [14]王兆胜.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J].文学评论,2002(6).
- [15]阳雨(王蒙).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N].文艺报,1988-1-30.
- [16]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J].北京文学,1998(10).
- [17]〔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立荣)